

对事实的状态或性质的大肆渲染。在现代司法实践相区别的意义上，希腊的审判是对人不对事的——它更关注对（当事）人的品行的鉴定，而不是对某件事（罪行）的澄清。而一个被鉴定为“好人”的人，自然不会做那被起诉的坏事。它所追求的是比今天的司法正义更朴素、但也更接近历史原型的正义：鉴定一个人是“好”是“坏”，比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恰好“做了那件坏事”，要重要得多——如果非要做出选择的话。一个一贯表现良好的公民即便不慎做了那件坏事，但被错误地开释了，也比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即便没有做那坏事，却被错误地被判有罪，要更加正义。德摩斯梯尼甚至提醒陪审团不要让“现在的时刻”在可信性上超过其他“所有时刻”，因为，在“现在的时刻”，被告的说辞是可以伪造的，但在其他“所有时刻”，他的表现是无法造假的。这种说法几乎否定了现场辩护的正当性。这样的审判方式当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希腊并不是一个建立在专业分工之上的社会，没有专业的刑侦机构去搜集证据，也没有专业的检察官对证据进行甄别和提起公诉。但另一方面，发生在法庭内的辩论本来就与法庭外的广泛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希腊人没有理由把审判范围限定在案件本身。

### 希腊政治的条件：奴隶制、观剧津贴与政治之爱

希腊奴隶制是从现代回溯上古所产生的另一处理论重灾区。奴隶制（slavery）这种现代的强化劳动，首先出现在18世纪的美洲种植园，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全球生产的一部分。把它平移到希腊社会进而用它来命名这个社会（奴隶制社会），其学理出发点，是为这个在道德上



《荷马史诗》。

困扰殖民者的生产方式寻求来自时间深处的正当性背书：（西方）历史本来就是如此。

但被指认为希腊的“奴隶”主要分散在普通公民家中，即那种“经营一块世袭地产以便传之于子孙”的家庭，而不是“牟取利润的无个性特征”的商业机构。古典奴隶制——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与现代奴隶制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手段，而是把劳动逐出公民生活范畴从而让公民可以全心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历史性尝试。公民需要奴隶却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消费，正是消费奴隶的劳动换来了公民的自由，即“闲暇的财富”，以及对于生存的超越的看法。而作为财富的闲暇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进而构成某种阈值，超过此阈值的任何在强化劳动或技术革新领域的进步都是无意义的。因此，古典奴隶制并不像现代奴隶制那样对直接生产者施以重压，也不寻求有侵略性的生产技术。

古希腊语表达“不工作”的词是scholē，意为“闲暇”，而“工作”却写作否定形式的ascholia，意为“缺少闲暇”。这个语言学现象表明，在希腊人的观念中，“闲暇”才是正当的生存状态。但在现代社会，闲暇只是工作过程中的暂时的功能性中断，中断是为了更好的工作。现代奴隶主可以把劳动转给奴隶，但他无法把内在于市场社会的生存压力也转给奴隶，因为这种压力并不终结于生存必然性的满足，而是用财富占有上的永无止境的竞争来定义。这样，能够摆脱工作的公民形象被彻底扼杀了，即便是职业政治家，也是从职能分工的意义上把政治理解作为一种“工作”。

“观剧津贴”（Theorika），顾名思义，就是城邦资助公民看戏。以J.B.Bury为代表的古史学家把这解释成政客拿公共资源购买政治支持，体现了民主政治内含的